

閱讀與書寫，點亮每一個人的燦爛時光

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負責人 | 張正

* 前言：異鄉客愛讀書

2005 年底，35 歲的我放下報社的工作，拿了教育部的獎學金，以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的學生身份前往越南胡志明市，在當地的大學學習四個月越南文。

很開心，年輕時沒有機會出國留學，現在不但出國了，還有人替我出錢。研究所的越南籍學長陳仲才帶路，替我在學校附近找了專門租給外國學生的乾淨套房。我每天上午上課兩小時，下午沒事，有時在學校裡複習、預習，有時和外國同學喝咖啡聊天、閒逛觀光。還認識了宿舍附近的道地越南人，偶爾相約吃海鮮喝啤酒，雖然雞同鴨講，但也樂趣無窮。

不過，多半的時間還是獨自一人。這時候，只能閱讀了。大約在第二個月，我帶去的中文小說就全都看完了（平常在臺灣根本沒這麼認真）。幸虧，多帶了一本佛經！每當夜深人靜，不信佛的我，竟也把佛經讀得津津有味。

而很多獨自閒逛的時光，我會逛進胡志明市區的書店，裝模作樣地翻一翻越文書，搜尋剛剛學會的越文單字。更飢渴的是搜尋中文書，不管好看難看，只要看得懂，都好看！我也曾經到胡志明市的華人區，專程買一份中文報紙（當地唯一的中文日報「西貢日報」，薄薄兩張），或者買一本粗糙盜印的亞洲週刊，帶回宿舍，看完每一頁。

雖然前來越南的目的就是學越南文，但我不是天才，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學會一種文字。獨自在異地，母語書籍終究是最即時的救贖。

* 閱讀的權利：移民工刊物的發想與實踐

與我這種短期留學的異鄉客相比，長期生活工作在臺灣的數十萬移民工、尤其是多數處於社會底層的東南亞移民工，閱讀母語更個奢望。懷著這份體悟，我在 2006 年初回到臺灣。

就在此時，我的老闆兼老師、已故臺灣立報社成露茜社長提議：咱們來辦一份東南亞文字的月刊吧！成露茜早年留學美國，對於異鄉客可能遭受的歧視與排擠，深有體會。她任教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期間，就曾經帶領學生出版英文、中文、西班牙文的定期通訊，服務當地移民。

這，真是個讓人迫不及待想挽起袖子執行的好點子！我的越南文雖然學得零零落落，但是在當時的臺灣媒體圈，也算是前幾名吧。另一位跳火坑的是丘德貞，他是留學臺灣的香港僑生，曾經擔任臺灣立報社旗下《破週報》的主編，因為採訪的緣故，熟悉也喜愛泰國的文化。

另外加上我的妻子、當時的臺灣立報副總編輯廖雲章，我們幾個人在成露茜的指令之下，分頭進行不怎麼嚴謹的田野調查、財務評估、人員招募，利用臺灣立報現有的空間與設備，動手開工，匆促地在 2006 年 9 月出版了臺灣第一份的泰文和越文刊物：泰文《พลังใหม่ 新能量報》

與越文《Bốn Phương 四方報》。

真正投入之後，才發現除了政府出版品之外，場子裡早有其他「同業」：全無媒體經驗的菲律賓籍配偶 Nene Ho，前一年（2005 年）已經獨立創辦第一份東南亞多語印行的定期刊物《The Migrants》，只是隨後縮小戰線，專攻菲律賓族群。

印尼文刊物更是百花齊放。同樣在 2006 年間，一間進出口公司辦了《Tim》、印尼留學生曾國榮與譚雲福辦了《INTAI 守望月刊》、印尼留學生沈天德辦了《Indosuara》，都有不錯的銷路。

至此，在臺灣的菲、泰、印、越四大東南亞族群，都有了至少「一份」屬於她／他們的刊物。而人數相對較少的四千多名柬埔寨婚姻移民，以及來臺年代更早的緬甸移民，則要等到 2011 年的柬埔寨文版《四方報》、2015 年的緬甸文版《四方報》，才算擁有除了政府出版品與當地進口報章之外的專屬刊物。

在臺灣的每一本「非中文」刊物，都可以稱得上是一場文化行動：它們改變了臺灣出版市場的現況，即使只是鑽開一線裂縫；它們讓「非中文人」有所閱讀、有所發聲，即使只是不成比例的極小空間。

除了因為「存在」本身而造成的變化之外，多數東南亞文字刊物出版者也懷抱著培力（empowerment）讀者的主觀意圖。例如《The Migrants》主編 Nene Ho 便說，該刊物的初衷，即是希望菲律賓讀者「別因為語言隔閡成為資訊文盲，繼而變成社會上的弱勢」。（注 1）

《Intai 守望》主編曾國榮則希望他的刊物「扮演捍衛印尼人尊嚴的角色」，例如擴大報導在臺灣表現優異的印尼人，也擴大報導在異鄉為非作歹的同胞，讓他們「有所警惕，不做讓家鄉蒙羞的事情」。（注 2）

更不用提《四方報》了。《四方報》開宗明義地表示：「企圖作為弱勢發聲的平臺，衝撞主流媒體長期對於新移民／工窺奇、刻板的報導角度；進而凝聚弱勢者的力量，發起跨界文化鬥爭，爭取新移民／工應有的權利。」（注 3）

*「現身」儀式：唱四方與移民工文學獎

到了 2013 年，《四方報》已經頗具規模，每月同步發行越南文、泰文、印尼文、菲律賓文、柬埔寨文版本。這年，我決定離開《四方報》總編輯一職，因為發現了更新鮮有趣的事：電視。

媒體前輩、外籍勞動者發展協會理事長徐瑞希說，臺灣綜合臺有個空出來的時段，要不要一起做個東南亞電視節目？剛好，一位企業家捐了一筆錢，指定用在移民移工身上。

我和徐瑞希找了正在替電視臺拍攝《四方報》報導的攝影團隊「辣四喜影像工作室」，一塊兒商量如何在有限的資金下，製作出每週一次的東南亞電視節目。經過幾次腦力激盪，推翻了一些製作電視的既定概念，臺灣第一個自製東南亞語言的電視節目「唱四方」，出臺！

這是一個歌唱節目，卻沒有正式的舞臺或攝影棚，因為我們直接扛著攝影機，前往移民移工生活、工作、休閒的場所，在沒有排練的狀況下，請他們拿著麥克風、對著鏡頭、以母語唱

歌或者說話。捕捉了最真實的感情與場景之後，再剪成半小時的節目，每週日在臺灣綜合臺及 Youtube 上播出。

雖然製作方式很陽春，但是電視節目實在燒錢。企業家最初的捐款早已用盡，幸虧文化部、星展銀行、以及我的親友們接力支援，讓節目自 2013 年 7 月 7 日開播之後，至今（2015 年 6 月）持續播出。

六十萬東南亞移工、二十萬東南亞婚姻移民，占臺灣人口不小的比例，不過在電視這個主流的傳播載體中，他們卻極少、極不成比例地出現。「唱四方」最大的意義，即是「讓東南亞移民移工上電視」，讓他們有機會在電視上說話、唱歌，在電視上被臺灣人、也被東南亞移民移工自己看到。

浪漫一點說，這是八十萬東南亞移民移工的「獻聲」與「現身」儀式。

同樣具有「儀式性」意義的，則是「移民工文學獎」。這還是得從《四方報》談起。

《四方報》從 2006 至 2013 年間，總共收到了一萬八千多封越文的讀者來信，絕大多數都是投稿，希望自己的心情或者創作，能被刊登在報上。編輯部在 2012 年，先將其中與「逃跑外勞」相關的稿件，集結成冊，出版了越文版和中文版的《逃：我們的寶島，他們的牢》，頗獲好評，甚至獲得了該年「開卷好書獎」的評審團獎。隔年，編輯部又將其中與「離婚外配」議題相關的稿件集結成冊，出版《離：我們的買賣，她們的一生》。

因為這兩本書，我認識了佐渡守和黃湯姆。來自臺灣文學界的這兩人，認為當今臺灣的移民移工書寫非常重要，應該將其「典律化」，向上抬升這些作品的地位。談著談著，我和廖雲章、佐渡守、黃湯姆、阿潑、陳柏偉、幸佳慧等人，決定無中生有，籌辦「移民工文學獎（Taiwan Literature Award for Migrants）」。

目標確定，接著找錢找人。先向文化部申請經費，同時尋求文壇前輩的支持。政大臺文所教授陳芳明、印刻雜誌發行人初安民、作家駱以軍、顧玉玲等人，在第一時間首肯。而確定文化部的部分補助之後，我們也硬著頭皮向企業界、向各類型基金會申請不足的款項，竟也都意外地順利。

終於，由外籍配偶暨勞工之聲協會和臺灣文學館共同主辦、多個單位共同協辦的第一屆移民工文學獎，於 2014 年風風火火地開辦了。參選資格只有一條：「在臺生活（或曾經在臺）之新移民、移工、及新移民二代」。作品規則有兩條：「一、文體不限，3,000 字內（以翻譯為中文後估算）。二、以越文、泰文、印尼文、菲律賓塔加洛文（Tagalog）等書寫之作品。」

十萬元新臺幣的首獎，自然吸引不少移民移工投稿參賽。然而，母語評審挑選出的入圍作品，必須經過翻譯，再由中文評審做最後裁決，引起不少爭議。

作為主辦單位，我們只能再三解釋、抱歉：翻譯的確是問題，但是如果翻譯，不可能找到同時精通各語的評審；尚若不翻譯就直接選定各語的首獎，那麼，這樣非中文的文學獎，又何必由臺灣人來辦呢？

不過對我來說，文學獎只是手段。文無第一，天底下原本就沒有「最好」的作品，我期待

的是，一方面以文學作為通道、以獎金做為誘惑，將移民移工拱上舞臺，說出故事，展現他們作為一個人的質地，贏得尊敬；另一方面，則是請移民移工以文學的形式，說出他們對於臺灣的「評語」，同時也拓展臺灣文學的範疇。

* 海洋也阻擋不了：帶書運動、燦爛時光、GEMAS

在第一屆移民工文學獎中，許多都是自傳。相較之下，印尼籍得獎者 Erin 的作品相當特殊，她寫的是一則虛擬的故事，但是細節刻劃又那麼細膩，我幾乎以為是真的。尤其是她接受訪問時說的一段話，讓我耿耿於懷。

Erin 說，雇主家對她很好，但是阿公非常依賴她、離不開她，以致她在臺灣兩年，「沒有放過一天假」。不能離開小小的社區，閱讀和寫作是她唯一的出口：「閱讀給我力量，寫作讓我自由。」Erin 用清楚的英文說。

啊！如果當時我的手邊有印尼書，一定雙手奉上！可惜我沒有。

想要改善東南亞移民移工的大環境，很難一蹴可幾。但是，如果一本母語書就能讓移民移工自由、給予力量，豈不是捷徑？我託在印尼、越南的朋友，在當地買了幾箱二手書，用海運寄回臺灣。當幾箱我看不懂的書終於飄洋過海到臺灣、攤在我家客廳地板像小山時，我起了幾個念頭。

第一，把一本珍貴的來自家鄉的書送到移民移工手上，所能得到的感謝，其價值一定遠遠超過買書的價格。這樣的美事，不該只有我一個人做。

第二，靠我這個沒有穩定收入、存款有限的個人買書，絕非長久之計。然而每年往來東南亞的臺商、志工這麼多，如果一人帶一本，這樣就有源源不絕的書啦！

第三，這一整套書籍運送的流程，還是需要一個營運的實體場地（總不能通通放在我家客廳吧）。最適合的場地，就是書店了。而且據我所知，臺灣還沒有東南亞專門書店。

「帶一本自己看不懂的書回臺灣」計畫於焉成形，志同道合的伙伴們也開始尋覓適合開書店的店面。在這段期間，我則是東跑西跑，和許多獨立書店洽談，希望他們可以作為帶書運動的「中繼站」，也就是各地的「收書點」：當有人從東南亞帶書回臺灣時，可以先將書籍放到收書點，等收集到一定數量之後，再一起寄給我，以減少運送成本。

終於在 2015 年初，靠著文化部補助的「望見書間」，在移民工假日聚集的桃園後火車站開張，而我和母親、妻子、朋友合資的「燦爛時光」，也在緬甸移民聚集的新北市中和區南勢角成立。我更大言不慚地對外宣稱，我們這是「東南亞閱讀大聯盟」，理想是在全臺灣每個縣市都成立一家東南亞書店，因為，全臺各地都有東南亞人呀！

沒想到，我自以為的「大言不慚」，其實還太小鼻子小眼睛。包括前面提到的 Erin，以及另一位印尼籍移民工文學獎得獎者 Nanik，她們原本就組織了一個海外印尼移工的寫作團體。看到臺灣人在臺灣成立以東南亞書籍為主的書店，這批「移工文青」得到啟發，隨即組織了印尼閱讀文化推廣協會（gerakan masyarakat sadar baca dan sastra），預計返國之後，分別在各

自的鄉村設立小型圖書館，讓知識在鄉村扎根。

2015年6月，GEMAS在「燦爛時光」召開記者會，小小的書店擠滿了人。Nanik宣布，她們將在一年內成立四家圖書館，第一間將在下個月（2015年7月）於中爪哇省的芝拉扎開幕，而這間圖書館的負責人，就是即將回國的Erin。

等到那一天，「東南亞閱讀大聯盟」就真的一步跨海了！

* 結語

對於一個異鄉客來說，尋找原生文化場域是件重要的事。文化包括了某些抽象的、無法直接看見的、形式與功能不顯著的元素（注4），原生文化場域也無確切精準的內涵，大約包括了熟悉食物、面孔、氣味、語言、音樂、物件空間等等。

異鄉客，尤其是已具備成熟文化的成年異鄉客，之所以渴望進入原生文化場域，未必是因為受了什麼欺負，只是為了抓到一點無以名之的安全感；但若受了欺負，這一點安全感就變得非常重要了，它還能發展出所謂的同仇敵愾，經由同一社群者的你一言、我一語，出主意、想辦法，不僅能給自己在惡劣環境堅持下去的慰藉，甚至可以發展出反撲的勇氣與策略。

不論是母語刊物、母語電視節目、或者母語書店／圖書館，都是試圖替異鄉客營造一個「我們正在一起聽、一起看」的集體感，有點「千里共嬋娟」的味道。對於臺灣本地人來說，也許暫時難以改變不公道不正義的政策，但是人與人之間的友善對待，則可以從自身做起。學一句東南亞的招呼語，一個點頭一個微笑，或者從東南亞「帶一本自己看不懂的書回臺灣」、送給身邊的異鄉人，立刻就能同時替異鄉客與自己，創造片刻的燦爛時光。

注釋

1. 梁友瑄，〈落地臺灣的東南亞媒體〉，載於：廖雲章主編，《中華民國新聞年鑑 1997-2006》（臺北市：中國新聞學會，2007），頁 142-174。
2. 同注 1。
3. 張正，「全球化之下新移民／工社群的跨界文化鬥爭：移民媒體與弱勢發聲，臺灣立報越南文版《四方報》的實驗與實踐全球化之下東南亞移民／工社群的跨界文化鬥爭」（南投縣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，2008.2）。
4. Bronislaw Malinowski, 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 (Chapel Hill: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, 1944)